

「誰的悲情誰的歌？」第二場發言稿

／張釗維

一、消失的左眼

去年的這個時候，我正在進行《消失的左眼》的剪接工作；這是公共電視「狂飆的世代：台灣本土學運」當中的一集，處理的是白色恐怖時期的學生運動。「消失的左眼」這個名稱，來自陳映真先生接受訪問時，對那個時代所作出的總結形容；陳映真先生說，五零年代的白色恐怖，使得台灣從此沒有左派的社會科學、文藝理論與世界觀，就像缺了一隻左眼。而這也是這一集一開始就必須處理的歷史情境。從那時候起，在台灣，「左派」成了一個禁忌的名詞，到今天，許多時候，仍然只能用「理想主義」這樣的措辭來隱晦地指涉那個時代、那群受難者。

當時正處於總統大選前後，紛擾動盪的社會氣氛當中。我每天不時注視著電視上各種令人詫異、不安甚至氣憤難消的政治發展，再回到剪接台上，看到監視器螢幕上，參與秋祭的老者花白著頭髮，蹣跚但堅定地走向馬場町的土丘，向四五十年前死難的同志獻花致禮，在胡德夫《青春進行曲》的現場歌聲中，我突然感到一陣錐心之痛：

我們的青春 像烈火樣的鮮紅
燃燒在戰鬥的原野

我們的青春 像海燕樣的英勇
飛躍在暴風雨的天空

原野是長滿了荊棘
讓我們燃燒得更鮮紅

天空是佈滿了黑暗
讓我們飛躍更英勇……

（《青春戰鬥曲》）

霎時，在這些影像與這首歌之前，我忍不住悲從衷來，掉了淚；因為深深地感受到，對不起這數以千計的先行者，不管是死去的、或是倖存的。他們以生命堅持了理想主義的道路，奉獻了自己最寶貴的青春；數十年之後，主流社會不再去咀嚼、反芻他們的過去，相對的，他們曾經為之獻出生命的故鄉，在他們的標準底下，卻變成是一個充滿著浮誇功利、詭詐欺瞞的島嶼。這對於那些倖存者以及他們所懷抱的理想主義來說，活到現在，親眼所見，豈不是一個巨大的反差？

那是何等的情何以堪？

我想起歌手沈懷一的詩句：

更久遠之前，也有一些先行者，武裝了思想，他們沒有投降。
如今，魂魄就在這島嶼的天上憂鬱籠聚！
有時他們落淚，有時痛哭，因為
他們的下一代早已被馴服！

二、噤聲的一代

在拍攝「消失的左眼」的過程中，我們曾多次前往高雄拜訪前基隆中學的教師李旺輝。他因為「基隆中學案」（白色恐怖第一案）而繫獄多年，事隔五十五年，對於是否要接受我們的拍攝採訪，依然考慮再三。近幾年來，在跟許多老同學們接觸的過程中，我逐漸了解到，直到今天，他們對於當年許多經歷的隱瞞，與其說是因為白色恐怖的陰影，不如說是因為，這個社會發展到現在，依然癱著一隻眼，而對他們所懷抱的理想、所信奉的理念，缺乏同理心的認知與包容。如果說了，卻要面對現實世界的漠然、扭曲，甚至訕笑，那反而是對自己生命情懷以及歷史尊嚴的斷傷。

藍博洲十多年以來所進行的，因而是一個極為不容易的工作。他不是像窺視狂那樣，窺探一個大家都不知道的事情然後急著到處嚷嚷，也不僅僅是飢渴地揭開那塵封的歷史而已；在小心翼翼地探求真相的同時，他還必須考慮到，如何跟大社會進行溝通、再現，才不會對受訪者與那隻缺陷的眼睛造成二度傷害。

三、冷戰的情結

在看完「消失的左眼」初剪帶之後，一位年紀跟我相當的媒體朋友跟我說，他終於明白，白色恐怖跟二二八是不同的兩回事。

究竟，需要多少扭曲力量的層層相因，才能夠讓下一代搞不清楚這些不過是半世紀前的不同歷史過程，其中的關聯性？而為什麼，二二八有那麼多人討論，白色恐怖的歷史，卻乏人聞問？這其間的反差，說明了什麼？二十一世紀的這個島嶼，是如何徹底遺忘了老同學跟他們的理想主義的？這個遺忘與壓抑機制的形成，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今天我們常使用「後冷戰」這個詞來描述現在的世局，但我懷疑，依台灣的現況，對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至今尚未有一個比較平衡的、宏觀的、不同於國民黨恐共反共教育的看法，究竟，我們已經脫離冷戰了嗎？抑或是，在今天朝鮮

半島三十八度線尚未消失、台海局面尚未緩和的具體現實底下，「後冷戰」只是一個用以迷惑人心的說辭？

那麼，追根究底，我們為什麼需要「冷戰」？或者，說穿了，甚至是對冷戰有一種下意識的欲求與依賴？僅僅是因為如反共宣傳所說的，自由與奴役、民主與專制的對抗？或者，那是西方壓制舊有殖民地與次殖民地的新時代法寶，而我們並不自知？為什麼亞洲的某些國家或地區，就必需承載以美國權力人士為首的西方軍事資本主義擴張勢力所交付的任務——從軍事堡壘、經濟代工到意識形態再生產？我們有沒有更多的歷史與地理縱深，去看到十九世紀以來，美國在鎮壓印地安各族、砍掉夏威夷國王之後，越過太平洋一路往西，進入東亞的擴張過程？它是以一種什麼樣非傳統帝國主義的形式與策略，在二十世紀的幾次大小戰爭之後，建立起新的帝國的實質，並且繼續在新世紀當中，敲打著戰爭的魔音？而曾經作為殖民地或次殖民地的我們，又如何能在「後殖民」的時代被編派入這個新帝國之眼的視界當中，從而失去了對於某些歷史過程與人物事蹟的記憶能力？

我相信，對這些問題進行不斷的質問，才能夠真正解開那加諸在白色恐怖歷史與老同學身上的無言枷鎖。

四、記憶的線索

向度一：東亞各國的冷戰與白色恐怖經驗

冷戰是一個跨國的現象，不只是在台灣發生。2000 年在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有一部談印尼白色恐怖的紀錄片，就叫「shadow play」皮影戲。狀況與台灣非常類似，就是在蘇卡諾、蘇哈托政權轉型的過程發生了對於印共強力的鎮壓，同時，也是後來幾十年之後才發現當初埋屍的地方。導演還追溯了當時西方各國怎麼樣跟當地政權產生什麼樣的關係。不只印尼，韓國、菲律賓等冷戰防線沿線的每個國家其實都有類似的經驗。

向度二：國民黨法西斯右翼與中共地下黨的形成

地下黨不只在台灣，當年從國共合作破裂開始，在國民黨統治區域就出現了共產黨的地下組織，一直延續到 1949 年。從這個角度來看，白色恐怖除了是在國際冷戰的影響之下，同時也是在國共鬥爭的數十年歷史過程的必然產物。這裡面有一個比較寬廣的脈絡或網絡在那裡。

向度三：戰後台灣左翼運動歷史的起伏

如果我們說五零年代使得左邊的眼睛消失，那麼，他是否就從此永遠消失了呢？在 1970 年前後，左翼的苗芽又如何一點點的冒出來？我們該去看看 1968 年、文革與保釣運動的影響。這條線索，描繪的會是，台灣的歷史脈絡裡面左翼

運動的斷續過程。

向度四：在台灣，對大歷史的記憶與認知有可能嗎？

然而，這些線索都牽涉到台灣對於大歷史的認知態度。近十多年來的自由化與多元化，儘管打開的民眾的視野，獲得了形式上的民主自由，但是過分強調斷裂而忽略延續，造成漫天蓋地的零碎化資訊，卻對大歷史的敘事與認知環境造成重大傷害。這使得媒體與知識份子普遍地見樹不見林，抓住一點芝麻綠豆大的事情，就可以大作文章。相對的，對於整體歷史浪潮與潛流的延續性，以及對當下的作用，缺乏足夠的視野與掌握。舉例而言，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六十週年，作為當事者之一的台灣，至今好像不大有人注意這個事情。與此同時，所有亞洲主要的參戰國，都在為這大歷史的重新耙梳與再詮釋預作準備，比方說，中國大陸去年已經派了紀錄片的團隊到台灣來採訪。相對地，在對於大歷史經常自覺或不自覺地保持緘默的台灣，可有任何發言以及在其中安置自身的能力？